

从普世主义与帝国传统 走向民族主义

——齐亚·格卡尔普的土耳其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下）*

刘中民

内容提要 奥斯曼帝国晚期意识形态混乱困扰着处于孕育发展状态中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这构成了齐亚·格卡尔普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格卡尔普对较有影响的各种政治思潮进行了分析与批判，重点批判了奥斯曼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帝国传统与宗教普世主义，倡导并支持以民族认同为基础的土耳其民族主义，其最高理想是通过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民族化，摆脱外国侵略，获得民族独立，建立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土耳其的伟大民族复兴，并最终实现土耳其现代化。

关键词 格卡尔普 奥斯曼主义 泛伊斯兰主义 土耳其民族主义

作者简介 刘中民，法学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现代化改革，导致了政治、法律和教育领域的世俗化，世俗化思想与伊斯兰传统政治思想之间的矛盾与斗争也由此全面展开，并在帝国的思想领域显现了泛伊斯兰主义、现代主义和土耳其主义的分化。泛伊斯兰主义主张依靠伊斯兰教实现帝国的振兴，并成为苏丹哈米德二世加强帝国统治的重要工具；现代主义主张按照西方文明和欧洲模式改造土耳其；土耳其主义主张在保留民族文化的同时引进西方的文化和技术，并主张政治的世俗化和文化生活的土耳其化，同时主张泛土耳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与泛奥斯曼主义和泛土耳其主义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影响奥斯曼帝国解体前社会政治思潮的重要因素。如何摒弃各种泛民族主义思潮中的宗教普世主义和帝国政治传统，是土耳其民族主义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此问题是由凯末尔主义解决的，但格卡尔普在倡导民族认同、否定宗教认同和帝国认同的基础上提出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观点，显然对后来的凯末尔主义有启示作用。本文将探讨格卡尔普批判宗教普世主义和帝国政治传统，倡导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政治思想。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政治思潮与意识形态

19世纪80年代，在效仿西方的伊斯兰近代改革运动——“坦齐马特”（“Tanzimat”，为整顿改革之意，故称“坦齐马特”时代）改革和新奥斯曼党人的立宪活动失败后，奥斯曼帝国进入哈米德苏丹二世统治时期。当时奥斯曼帝国在意识形态上非常混乱，且存在着对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

本文系2006年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2008年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阿拉伯民族主义与伊斯兰教互动关系研究”、2007年上海市曙光学者计划“当代中东国际关系中的伊斯兰因素”及上海市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成果。

和泛土耳其主义的争论。但占据帝国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是奥斯曼主义，“所谓奥斯曼主义，简而言之，就是只承认统一的奥斯曼大民族，而奥斯曼帝国的其余各民族都必须‘奥斯曼土耳其化’。也就是说，国家只容许一个主义，即奥斯曼民族主义；一个政治实体，即享有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奥斯曼帝国；一种忠诚，即忠于统一祖国的爱国主义信念。”而泛伊斯兰主义仅仅是哈米德二世维系帝国统治的工具。但是，正如当时一个基督教徒在题为《伊斯兰统一》小册子中所言，泛伊斯兰主义已经无法挽救帝国的衰亡，当然更无法实现对穆斯林的统一。但是，受当时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影响，以及哈米德二世的人为利用，泛伊斯兰主义仍然有重要的影响。

为推翻苏丹的专制统治，1889年“同盟与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成立，深受新奥斯曼党人纳米克·凯末尔（1840~1888年）思想的影响，被称为“青年土耳其党人”（The Young Turks）。青年土耳其党人奉行泛民族主义，其内容是泛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的混合体，而内部不同政治派别的思想倾向各异，这是奥斯曼帝国即将瓦解并向现代民族国家演进中思想极为混乱的一种反映。泛奥斯曼主义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指导思想，主张奥斯曼帝国内的非突厥民族必须使用被确定为国语的突厥语，只有通晓突厥语的人才有资格当选国会议员，少数民族只有保持自己宗教信仰的权利。泛奥斯曼主义是赤裸裸的民族沙文主义，在出笼后立即遇到了巴尔干各民族和阿拉伯人的抵制与反抗。泛突厥主义又称泛突兰主义，它与泛奥斯曼主义密切相连，是泛奥斯曼主义在对外政策上的反映，即梦想建立一个泛突厥语族的联邦，把西亚、中亚、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部族合成一个政治实体。但二者具有的一个共同特征是都把伊斯兰教作为一种工具加以利用，并且在关于国家政治建构的思想方面无法割断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复杂联系。纳米克·凯末尔作为青年土耳其党人的重要理论家，其民族主义思想是“政治自由主义与宗教保守主义相结合的产物”。伊斯兰教对于青年土耳其党人时期奥斯曼帝国政治思想与社会舆论的影响，恰如一位学者所言：“一些出版物仍然围绕泛伊斯兰教及其作为实现世界范围内穆斯林共同体的手段进行讨论，以加强挽救奥斯曼帝国的力量”。

总之，在奥斯曼帝国晚期，政治思想领域严重混乱，泛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政治思潮的交互渗透，且同传统与现代、东西方的矛盾与斗争交织，这一切都表明，在行将崩溃的奥斯曼帝国内部正进行着一场剧烈的思想斗争，同时也正酝酿着奥斯曼帝国从传统帝国形态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的社会政治变革。这一切构成格卡尔普民族主义思想产生的重要历史背景。

格卡尔普对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甄别和批判

如何对当时在土耳其较有影响的各种民族主义思潮进行评判，构成了格卡尔普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格卡尔普对较有影响的各种民族主义逐一进行了分析：

(1) 种族主义的土耳其主义者（Racist Turkists）：他们认为，民族和种族意味着同一和相同的事物。格卡尔普则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概念与社会学意义上的民族概念的含义。社会学的研究表明，种族特征与民族性（Nationality）毫无联系。(2) 族群主义的土耳其主义者（Ethnicist Turkists）：他们认为，民族性与血缘关系密切相连。格卡尔普则指出，即使在史前阶

See Jacob M. Landau, *The Politics of Pan-Islam: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Clarendon Press, Oxford, 1990, p. 8.

吴云贵、周燮藩著：《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28页。

E. I. J. Rosenthal, *Islam in the Modern Stat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5, p. 28.

Jacob M. Landau, op. cit., p. 73.

See Ziya Gökalp, *What is a Nation*, Translated and 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Niyazi Berks, *Turkish Nationalism and West Civilization*, Selected Essays of Ziya Gökalp,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34 - 137.

See ibid., p. 134.

段,人类也没有血缘的纯正性,战争中对妇女的掳掠、移民和同化使任何群体都难以保障其血缘的纯正性。民族意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并不是先天形成的。语言、宗教、审美意识,以及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这一切都是通过教育从社会获得的。社会特征不可能通过生物遗传获得,而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形成。因此,血缘的纯正性在民族形成中不起任何重要作用。”(3)地缘的土耳其主义者(Geographical Turkists):他们认为,地理因素在民族形成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民族是生活在特定地理区域内的人们的总和。格卡尔普则认为,社会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与特定的地理区域并不总是吻合的,如在伊朗地理区域内居住着波斯人、库尔德人和土耳其人,但是“他们在语言和文化上都彼此各不相同,因此,很难讲这些群体可以称之为一个民族。”他指出,民族并不总是与特定的地理区域相对应,“有时在相同的地理区域内居住着若干个民族,当然也有一个特定的民族居住在独立的地理区域内的情况。”(4)奥斯曼主义者(Ottomanists):他们相信所有生活在奥斯曼帝国内的人们构成一个民族。格卡尔普认为这种观点的“严重错误在于片面地认为一个帝国内的所有人构成一个单一民族,因为在帝国这一人类共同体内存在若干个文化上独立的民族。”(5)泛伊斯兰主义者(Pan-Islamists):他们认为所有穆斯林构成一个单一民族。格卡尔普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乌玛与民族的含义。“事实上,我们称属于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们为乌玛。因此所有穆斯林构成一个乌玛,但是民族只是一个语言和文化的共同体,而在其他方面则是可以不同的。”(6)个体主义者(Individualists):他们认为,民族就是个体相信自己属于其中的社会组织。格卡尔普则指出,“事实上,人们并没有这种自由与独立性,……每一个体可以通过其价值判断认定自己属于一个民族,但是他的社会情感则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并因此与他的民族变得密不可分。……民族对于个体而言是一种外在的客观存在。……民族不是一个像政党一样可以根据个体意志选择加入的自愿性组织。”

格卡尔普对上述观点的批驳充分显示了一个思想家的博学与思辨能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民族的定义:“民族不是种族的、族群的、地理的、政治的或者自愿结成的群体。民族是由接受共同教育,在语言、宗教、道德、审美等方面接受相同的知识财富的群体。民族并不是只希望与那些在血管里流淌着相同血液的人生活在一起,而是希望与那些分享共同语言与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的人们。我们的人类个性不在于生理机体,而在于我们的思想和灵魂。……将血缘作为民族的基础是荒谬的。只有共同分享的教育和理想对于我们的民族性(Nationality)才是本质的。”

反对普世主义和帝国传统 倡导土耳其民族主义

格卡尔普认为,在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土耳其主义之间引发的争论造成了土耳其政治思想的混乱。他认为,土耳其民族主义才是现代土耳其意识形态的正确选择。

(一) 反对奥斯曼主义

格卡尔普认为,奥斯曼主义是伴随帝国晚期现代化改革运动产生的一种力图维系帝国统治的政治思想,它是落后的,也是有害的。“当现代化运动开始后,‘坦齐马特’改革的支持者们相信,在由若干个民族和宗教群体组成的现有‘民族’的基础上创造一个民族是可能的。因此,他们试图给予民族一个不含任何民族色彩的新含义,并使用了有特定历史含义的古老术语‘奥斯曼’。……发明这一新概念不仅是无效的,而且是有害的,因为它对国家和民族,尤其是土耳其人自身造成了极其有害

See Ziya G kalp, op. cit., p. 135.

Ibid., p. 136.

Ibid.

Ibid.

Ibid.

Ibid.

的后果。”他认为，奥斯曼主义的错误在于简单和盲目地效仿西方，认为只要按照欧洲的国家体制进行改革就可以挽救帝国，并且错误地相信帝国内的人民可以构成一个民族。

格卡尔普认为，奥斯曼主义已落后于时代潮流，因为“今天的西方和东方都明确无误地证明我们的时代是‘民族的时代’（Age of Nations）。最能够影响这个时代的思想就是民族主义思想，国家必须以民族意识作为其统治的基础，忽视了这一重要社会因素的国家将注定失败。……在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下的人民只能接受那些民族主义者的统治”。但是，奥斯曼主义者无视帝国内各民族民族意识的觉醒，幻想把有自己民族特性的各民族捏合成一个“奥斯曼民族”，并维系一个行将崩溃的普世性帝国，这是造成土耳其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落后于世界，尤其是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他同时指出，土耳其人如果继续无视民族主义的世界潮流，对自身和帝国内的其他民族都是非常有害的。“土耳其人对民族主义思想的回避不仅对于国家是有害的，并将激起各民族的愤怒，而且对于土耳其人自身的伤害更是致命的。”他认为，只有产生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建立了民族政府，才能实现民族经济的强大，并实现民族和国家的振兴。“政府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在于土耳其人没有形成一个经济（商业的和工业的）阶层”，“由于土耳其人民族主义思想的或缺导致土耳其人民族经济的匮乏，同时也构成了土耳其民族语言发展和民族艺术模式形成的最大障碍。”他把对奥斯曼主义的批判和对民族主义的呼唤与土耳其民族经济、民族文化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加以考虑，在某种程度上看到了民族主义通过民族国家建构实现民族现代化的巨大作用，看到了民族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蕴藏的巨大能量。

（二）反对伊斯兰主义

格卡尔普对伊斯兰主义的批判是从区分文明的普世性和民族性入手的。他并不否认宗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并指出，“道德、法律、文学、科学和哲学作为独立的分支都是从宗教中发展而来的”，“文明的规则、原则及其规律的科学基础也都源于宗教。”宗教共同体曾经作为人类群体，其典型的特征是普世主义。但宗教只能作为人类文明的单位，而不能作为人类社会的单位，人类社会的单位只能是民族。尼亚兹·伯克斯对其思想进行了总结如下：“对于格卡尔普而言，社会进程只能从民族的历史发展即从原始社会向现代西方文明演进的过程中发现，在这种社会进化中，每个社会都形成了特定的文化。……相似种类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导致了‘文明圈’（Civilization circles）的产生。但是对于格卡尔普而言，这些只是‘共同体’，而不是社会。……它们只是虚弱而松散的形式，因为它们缺乏共同的文化价值纽带。”格卡尔普还认为，“普世主义情感在人类早期阶段就占据主导地位的说法是不真实的。普世主义真正占据主导地位的时期是欧洲的中世纪时代。但是如果我们分析一下，我们会发现中世纪时期的普世之爱 and 团结仅仅局限在欧洲的基督教群体。”

格卡尔普指出，伊斯兰教构成了一种文明单位，但并非社会单位，在伊斯兰文明内存在着拥有各自文化特征的民族，如阿拉伯人、土耳其人、库尔德人等。他仔细分析了土耳其人与伊斯兰文明的关系：“土耳其人作为一个民族群体融入了伊斯兰文明，土耳其语言及其文化随着阿拉伯语拼写和术语的引进而具有了伊斯兰的特征”；对于二者的关系，他指出，土耳其代表的是民族性，而伊斯兰教代表的是普世性。从宗教文明的角度看，土耳其人属于伊斯兰教的乌玛，但是土耳其人首先应该是“土耳其民族”。“我们是土耳其人，我们应该更多地用土耳其语言表述的价值观及其术语说明我们的

Ziya G kalp, "There Currents of Thoughts",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p. 72.

Ibid.

Ibid.

Ibid., p. 73.

Ibid., p. 74.

Niyazi Berks, in Niyazi Berks, op. cit., introduction, p. 25.

Ziya G kalp, There Currents of Thoughts,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p. 74 - 75.

See ibid., p. 75.

起源与个性，表达我们的道德、法律乃至宗教和哲学。”他认为，宗教共同体“乌玛”作为普世共同体，已落后于现代民族主义的潮流。“伊斯兰主义者的错误在于没有看到民族鲜明地区别于神学乌玛的现实，他们固执地坚持恢复沙里亚法。”“但是土耳其人作为一个民族必须使他们自己与现代的、世俗的西方文明相适应，因为他们过去的文明既不能与世俗化相适应，也不能与现代民族相适应。”“土耳其的动荡也恰恰在于它正处在从神学文明（乌玛）向一个过去一无所知的以现代民族为基础的文明转变过程中。”

（三）倡导土耳其民族主义

格卡尔普对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倡导土耳其民族主义。“格卡尔普的全部思想都围绕对‘民族’的理解而展开，而这也正构成了他对土耳其思想的主要贡献。”“格卡尔普给予土耳其人以新的界定，且成功地超越了他的前人和同时代的人。他倾其所能地清除和涤荡民族概念的神学含义。他满怀使命感地证明蒙昧的土耳其人在那个时代习惯于把自己的身份界定为奥斯曼民族或穆斯林成员，并且将民族与其他两个社会共同体相混淆，一个是作为普世性宗教共同体的乌玛，另一个是由若干个民族和宗教团体组成的政治组织。”在他看来，现代民族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形式，既不取决于种族和部族统一，也不是在政治、宗教和文明方面徒具象征性的组织。现代民族是有一整套文化价值观的独特共同体，是一个以有机团结、劳动分工和职能分化为基础的社会，同时也是一个向世俗化和民主化发展的过程，他对民族的理解体现了西方自由民族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他特别强调文化对现代民族的重要性，认为“只有文化才是充满活力的，并且能够为民族生活提供凝聚力和指导方向”，体现了德意志浪漫文化民族主义的思想痕迹。

格卡尔普认为，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最根本的错误，在于它们背离了土耳其的社会现实和发展趋势。伊斯兰主义的“乌玛”是指信仰同一宗教的人们，它可以包含若干个民族，乌玛与民族的关系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因此，乌玛不能等同于民族。奥斯曼主义把“民族”概念与奥斯曼帝国的国民等同起来，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它们都背离了土耳其人的现实，“我们必须使我们的概念与现实相适应，而不是要求事实与概念相适应。”他具体区分了乌玛、奥斯曼和土耳其民族的关系，提出了两个祖国的概念，即“乌玛的祖国”(homeland of Ummet)和“民族的祖国”(homeland of nation)，而奥斯曼在范围上处于这两个祖国之间。“事实上，伊斯兰祖国是所有穆斯林钟爱的土地。另一个祖国是民族的家园，对于土耳其人而言，我们称之为‘突兰’(Turan)。奥斯曼国家是依然保持独立的伊斯兰王国的一部分，其中一部分是土耳其人的家园，即突兰，其他部分是阿拉伯国家，它们同时也是一个更大的阿拉伯祖国的一部分。事实上，土耳其人对他们的家园突兰怀有特别的爱。”格卡尔普对于伊斯兰、奥斯曼、土耳其民族三者关系的区分是非常准确的，为他提出土耳其民族主义奠定了学理基础。

格卡尔普指出，土耳其人在政治思想上唯一正确的选择就是民族主义。奥斯曼主义和伊斯兰主义都已无法聚合土耳其人的身份意识，而在土耳其，家族与村落意识则更为狭隘。他认为，在当时的土耳其，“团结、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概念都是在家族、村落和城镇范围内的界定。乌玛思想过于宽泛，而家族思想又过于狭隘，土耳其人的心灵对于以牺牲精神和利他主义为基础的集体道德感仍然陌

Ziya G kalp,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Sociological Idealism",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 63.

Niyazi Berks in Niyazi Berks, op. cit., introduction, pp. 26 - 27.

Ibid., p. 24.

See ibid., p. 25.

Ibid.

Ziya G kalp, Nation and Fatherland,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 77.

Ibid., pp. 78 - 79.

生。在经济、宗教和政治机构方面随处可见的分散是我们国家体制的必然结果。”要形成土耳其社会的凝聚力，必须确立一种新的政治认同，伊斯兰主义和奥斯曼主义都无法完此历史使命，而“语言群体即民族群体最有能力承担这一使命。”他从三方面论证了民族认同的优越性：使用共同语言的民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民族市场；其次，语言相通的民族有助于形成共同的意识、共同的希望、同质性的情感和智力水平；同一民族有助于建立共同的军事设施和人民主权。他的这些思想的进一步延伸就是以民族为基础建立现代国家：“一个国家和祖国的制度只有以民族理想为基础，才能确保其持久性。”

格卡尔普认为，土耳其主义作为一种民族意识已经蕴藏在土耳其人民的历史和生活中，但是尚处在一种“无意识”状态，其原因在于传统“宗教文化”和“西方主义的坦齐马特文化”之间难以协调的矛盾，造成了土耳其人思想的混乱和民族意识的薄弱。因为伊斯兰文化是一种传统普世主义的东方文化，而坦齐马特文化是一种全盘的欧化主义和西化主义，它们都无法作为土耳其民族文化的根基。因此，“土耳其主义将作为民族文化取代乌玛文化和坦齐马特文化。”奥斯曼主义，还伊斯兰主义必将失败，因为无论是奥斯曼帝国，还是伊斯兰乌玛，它们作为一种共同体都无法保持其持久性，因此，也无法形成一个完整社会。从奥斯曼主义的命运看，“被统治的民族在帝国共同体统治下只能暂时忘记他们的民族认同。他们注定要从被奴役的沉睡中觉醒，并要求文化独立和政治主权。这一进程已经在欧洲开始。尚未启动这一进程的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将像已经解体的帝国一样走向瓦解。”伊斯兰文化尽管可以继续维持其存在，但是必须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而存在。在这里，他确实比较准确地洞察到了帝国纷纷解体，民族国家日益兴起的历史潮流，同时这也正是他主张土耳其人应该选择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原因之一。而对于伊斯兰教应该成为民族文化一部分的看法则体现了格卡尔普宗教认同应该服从民族认同的思想。

在主张把土耳其主义作为土耳其民族意识形态选择的同时，格卡尔普还系统地提出了建构土耳其主义的具体方案，并从语言、文学、音乐、宗教、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了系统论证（限于篇幅，作者不再全面展开分析），其思想宗旨是实现社会各领域的民族化与现代化。在他所设计的政治方案中，明确指出土耳其主义将不与僧侣主义和神权政治作任何妥协，宣称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是一场彻底的世俗主义运动，其目标就是建立现代的世俗民族国家。同时格卡尔普还表明了自己对土耳其民族运动领导人“伟大的穆斯塔法·凯末尔”的支持态度，认为他所领导的人民党“已经实现了人民主权，即代表我们的人民——土耳其民族的土耳其国家”，并“把我们的国家从外国入侵中拯救出来”，他们构成了“民众主义”的代表，“在未来民众主义将与土耳其主义携手前进，并最终实现我们的民族理想”。由此可见，格卡尔普关于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土耳其政治、经济、法律、道德、语言、文学、艺术、宗教和哲学的民族化，摆脱外国侵略，获得民族独立，最终建立世俗的现代民族国家，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及民族复兴。

（责任编辑：樊小红 责任校对：詹世明）

Ziya G kalp, "Nation and Fatherland",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p. 77 - 78.

Ziya G kalp, "The Ideal of Nationalism",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p. 80 - 81.

Ziya G kalp, "What is Turkism? - A Recapitulation",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 287.

Ziya G kalp, "The Aim of the Turkism? - A Recapitulation",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 289.

See Ziya G kalp, "The Turkist Programme", in Niyazi Berks, op. cit., pp. 290 - 313.

See ibid., pp. 305 - 306.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Darfur Issue: A Further Discussion on the Origin, Phases and Nature of the Darfur Issue

Jiang Hengkun

pp. 22 - 28

Before current conflicts, the situation in Darfur had been terribly intense and confused. Before mid-1980s, scrambling for resources and then the ethnic opposition in the region became more and more serious and the traditional tribal conflicts evolved into violent racial confrontation. By the end of 20th century, split of the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of Sudan and scrambles for the power of state

rendered political elements to the seriously-going ethnic conflicts, and then the coming solution of the southern issue set some example for the Darfur elites to obtain power and wealth by arm. So the current crisis in Darfur is not a contingency, it has been the general upgrade and extension of the original conflicts and a new battlefield for state power and wealth.

From Primitive Community to Nationalism:

—Ziya Gökalp and His Study on Turkish Nationalism (2 of 2)

Liu Zhongmin

pp. 38 - 43

The ideological confusion of the late Ottoman Empire puzzled the sprouting Turkish nationalism, which contributed to the importa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Gökalp's nationalist thought. Gökalp then studied and criticized various political thoughts of that time, focusing on the criticism of Ottomanism and the imperial tradition of Pan-Islamism and the religious Ecumenism. Gökalp advocated and

supported the Turkish nationalism based on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 top ideal is to break away from foreign control, obtain national independence, establish a mundane modern nation, realize the great national renaissance and finally bring forward the Turkish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nationalization of politics, economics, law, morality, language, literature, ar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On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Hong Yonghon

pp. 54 - 58

The controversy over the valid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CTR) has lasted long, which covers mainly three questions: does the situation in Rwanda really convey threat to the international peace? is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entitled to set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machine of justice? has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al encroached the sovereignty of Rwanda? According to the ICTR, it is only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that can read whether the threat to peace exists or not and when. The cognizance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s legal that the situation in Rwanda in 1994 constitutes the threat to international peace. According to Chapter 7 of the UN Charter, the Security Council is entitled to set up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to trial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s and maintain the world peace. Based on the motion of the Rwanda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and on the principle of "no breaking one's own promise", the objection from Rwanda government can not counteract the resolution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The ICTR is legal.